江南学术脉络

□姜晓云

阿诺德·汤因比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挑战和反应产生的结果，所以人类最早的文明，都出现于自然条件较差地区。

依照这种理论解释框架，以思想性和知识性为特征的学术文化，在江南温软的土地上产生和发展，应该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从个体生存的小生态环境来看，这个地区易于为生，以至使人产生了对自然环境的自然顺应感和深度倚赖感，“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自然思想的悄然滋生，应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江南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产生了顺应自然的泛神论思想；生活资料的易得，使伦理的教诲让位于审美的观照；再加上山、水、林、沼的阻隔，族群之间缺少交往与竞争，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长期处在自足封闭、闲暇少争的自然状态之中，文明的发展呈现出“杂花生树”式的自然生发景象，与北方文明“百川东到海”式的大一统场面明显不同。可以说，江南文明是以“质有趋灵”的诗性存在方式，标举以自然为中心的诗性观念，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版图的。由于江南地区文明发展不存在北方文明中食物链可能断裂之类的严重危机，因而也不会像北方文明那样由于应对严峻挑战而导致的智慧的早熟。江南地区文明缺乏这种“断乳”条件，因此在文化思想上更多的是对原始诗性智慧的自然延承与发展，习惯于个体情感自然呈现这种诗性表达方式，而不是采用认识论的态度。

与孔子同时的季札是江南学术人物的先行者，他的身上表现出与北方各学术流派不同的思想向度。首先，就是他的朴素的自然观，以及从中流露出的泛神论思想。季札的长子不幸早亡，季札在埋葬他时，“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在北方看来，这几乎是薄葬，与死者的贵族地位毫不相称。原因何在，季札在唁词中给予说明：“骨肉复归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亡也，无不之也。”视死如归，归于物质，不迷信来世，自然通达，却又相信灵魂不灭，万物有灵，眷念于今生，满怀着深情。其次，就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深情。季札在交聘中原时路过徐国，徐君爱其佩剑，待季札周游回来时徐君已死。季札特地前往拜墓，并拔剑相赠，言及“我心许之矣，今死而不进，是欺心也，爱剑伪心，廉者不为也”。这种源自自然本心的真挚情感，跨越了生死的鸿沟，超越了普通的伦理准则。东晋南朝士人风度实滥觞于此，这是江南学术文化里一直蕴藏着的宝贵传承。

与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解放仅仅发生在北方文化圈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解放发生在北方文化圈，而鼎盛于江南文化圈。我还想特别作一说明的是，对北方文化来说，这是一种新的质变，如同佛学进入中土；对江南文化来说，这种变化只是发展阶段上的飞跃，因为是北方文化的河流大规模地汇入了江南文化的河道。正是因为玄学、佛学进入江南，与江南本土的道教风云际会，才致使江南新的文化精神产生。“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脱。”这种新的文化精神深深地依托于江南道教。

饱历乱世的永嘉士族来到江南时，不仅失去了传统的物质、文化根基，甚至已经失去了思想信仰的支撑。但是，无论是抱残守缺的传统儒学，还是“贵无”的新兴玄学，甚至是追求“出世与超脱”的佛学，都在与江南道教的乱世遭逢中，找到了新的生发点。如前所述，江南人的信仰带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这种泛神论意识是道教产生与传播的思想基础。孙吴政权建立后，随着孙吴集团的信仰与倡导，道教发展由自发转为自觉，并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

当然，道教作为一种普世的宗教，其信仰对象是超自然的神灵，且多神论的松散形式，也容易与追求“出世与超脱”的佛学找到共鸣。就这样，由于整个时代失去思想信仰（或曰信仰多元化），也由于江南学术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促使道教、玄学、佛学等思想在同一时代中并列局面开始形成，并在并列发展中逐渐远离了具体的世俗，亲近于自然山水与清虚的玄理，形成了以“澄怀观道”为中心的诗性哲学。名士们也由西晋末的对伦理政治近乎粗鄙的怪诞，转变为东晋南朝时“居易而以求其志”式的“不竞”之风，“玄礼双修”的优雅风度中包含着一种以自然为中心的崭新的诗性文化精神。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记录了这种诗性文化精神。

江南地区各种学术思想的风云际会，不仅促进了江南学术思想的发展与飞跃，还在哲学与艺术方面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美学思想。诗性江南成为中国人心中的乐土。

江南是实学的发源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学术大家，学术研究贴近生产、生活实际，有利于国计民生、安邦治国。江南学术的职业化也是从顾炎武开始的。

江南学术的职业化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其中既有异族逼迫的因素，更是学术繁荣的结果。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由于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文化钳制，导致了江南学术界既有的“怀疑”精神的发展：从对空竦的宋明理学的反动开始，沿着汉代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的逆时针发展方向不断向前探究，直至先秦诸子乃至原始儒学。学术群体大量涌现，“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所独占”。在这不断地怀疑与否定、证实与证伪之中，一种奇异的现象产生了：学者们逐渐抛弃了曾经苦苦追求的致用的义理，转而眷顾于过去的知识本身，学术方法也由诗性的玄思转为实事求是的考证，走向实证主义的“朴学”。江南学术的职业化，使学术逐渐远离了政治和实际生活，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学术群体的形成，也有利于学术争鸣的开展。清代江南学术流派纷呈，主要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以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和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此外，江南学术世家的大量涌现，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随着清末国门被打开，西方学术思潮开始涌入，“国故”逐渐由置疑的对象转为“整理”的对象、“革命”的对象，儒学也尽失“建制”，变成了“游魂”。由于经济地理等原因（1840 年上海开埠），江南地区受冲击最大，也得风气之先。诸多江南学人走出国门，或自觉接受海外思想，以“博通古今”的国学功底，力求“学贯中西”，涌现出一批大师级的人物，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确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学术开山人物之一，陈寅恪是这样评价他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的：“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其中，自然切用、兼收并蓄、善于怀疑发见的江南学术传统与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文化视野

教子切忌学缠足

□罗彦林

我始终认为，孩子是最聪明可爱的，敢于说真话，也善于发现真理。在《皇帝的新装》中，发现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不正是一名孩子吗？

我 8 岁的女儿郊游归来，向我描述说：“云象牛奶一样洁白，小蝴蝶穿着花衣服四处飞，小黄（同学家的小狗）高兴地追着我们跑，真的好开心啊！爸爸，我要是小黄就好了，不用做作业，每天都能出去玩。”我听后心中一酸。既为孩子的语言自豪，是不假雕饰的自然，同时又为孩子童真的话心痛。8 岁的孩子，每天都要做大量的作业，周末又要参加各类补习班，没有一点点自由的时间。他们甚至羡慕一条快乐的小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我 8 岁女儿的奥数题，有些连我这个大学理科毕业的，都瞠目结舌，做不出来，更何况 8 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为什么要做这些题，有什么用？我常在肚里腹诽。但当着女儿的面，我是断然不敢说出口的。女儿对老师极度尊敬，回家开口闭口就是，今天我们老师如何如何说了。对老师的话，女儿奉为圣旨，对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是认真完成、一丝不苟。这是一件好事，孩子就应该尊师重道。但奥数不会做，女儿就急得哭闹。逼得我这个做父亲的恶补数学。人至四十，悟性不好，学习数学，苦兮苦哉。

中国的家长太爱孩子了，希望把孩子培养成一名天才，希望自己未曾实现的理想都能在孩子身上实现。因此家长们从不考虑孩子的天赋和兴趣，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各类学习负担。孩子整日被禁锢在教室里，嬉戏、游玩的天性被习惯性剥夺。对于孩子们的抱怨，家长充耳不闻。常常对人炫耀的是：看，我家孩子多懂事，做不完作业，就不睡觉。这种扼杀孩子天性的教育方式，让我心惊之余，不由想起了古代女子缠足的故事。

古时女子缠足之风，始于五代末。据说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期间，一味沉湎于声色、诗词、歌舞之中，整日与后妃们饮酒取乐。宫中有一位叫窅娘的嫔妃，原是官宦人家女儿，后因家势破败，沦为歌妓。她生得苗条，善于歌舞，深受李煜的宠爱。李煜诏令筑金莲台，高六尺，饰以珍宝，网带缨络，台中设置各色瑞莲。令窅娘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著素袜舞于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李煜看了，喜不自禁。此后，窅娘为了保持和提高这种舞蹈的绝技，以稳固受宠的地位，便常用白绫紧裹双足，久而久之，便把脚裹成了“红菱型”“新月型”，其舞姿也更为自然，美不胜收了 。时人竞相仿效，五代之后逐渐形成风气，风靡整个社会。这种违背自然与健康、建立在摧残妇女身体基础上塑造出来的“美”，不仅是美的极度扭曲和变态，对于封建社会施行对女性的压迫与控制，也的确收到了强化的实际功效。正如《女儿经》所说：“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约束。”缠足进一步强化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区划。

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种摧残女性身体的习俗，在后世却由同为女性的母亲“发扬光大”。古时女孩子在 5~8 岁左右，便要开始缠足。缠足的工作，多由母亲实行。缠足时，除拇指外，其余四指下屈，并用长布包裹，层层裹紧，最后，母亲不顾孩子哭闹，用针线死死缝住。两足被捆紧、发热、发炎、红肿后，脚会溃烂变瘦，有时甚至脚肢都会整个脱落，时间可达数天至两个月上下。

母亲在缠足时，是充溢着母爱的。她认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女儿好，为了女儿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殊不知今日视之，这与残害女儿有何差别？以此观之，今日家长关爱孩子的教育方式，也是每天都在扼杀孩子的天性、扭曲孩子的心灵。这种残害心灵的方式，尤胜于当年女子缠足。不知后人观之，又作何感想。有时，我真的想要大喊一句：愚蠢的父母啊，难道你们真的想把孩子培养成疯子和傻子吗？没有健康的身心，拥有再多的知识也是无用。更何况这种教育方式，泯灭的正是孩子最宝贵的——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今天的中国为什么那么缺乏一流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为什么那么多孩子表现出性格怪异和心理疾病等问题，这些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但最为可悲的是，我们的家长似乎都麻木不仁或脑残耳聋了，仿佛听不到孩子内心的渴盼和呻吟，还自以为是地美其名曰“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将来好”。殊不知，这种教育方式不仅输掉了孩子的童年，还输掉了孩子一生的幸福。

这种关怀，真是孩子无法拒绝的最深重的悲哀啊。

教育问题谈

《孙子兵法》的智慧

□冯光远

孙子重战、慎战的战争观

《孙子兵法》以《计篇》为首，开宗明义地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讲明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人民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不可不慎重加以考虑。在今天看来，防止战乱，确保国家安全稳定仍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孙子指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告诫人们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慎重地对待战争。即：“故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说到“道”，他主张政治修明，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至死不二，并认为这是制胜要诀。说到“天”，他教人们要依据日光、天象、气候、季节等情况，相时而动，不信迷信。说到“地”，他主张要善于利用战地形势的各种条件，借以立胜。说到“将”，他主张选拔将领，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才德，不可专尚勇力。说到“法”，他主张建立并实行军制、军法、军需各种制度，借以健全组织，加强纪律，充实力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子认为民意、天时、地利、将才、法令、敌情等主要条件决定战争的胜负，是十分正确的。

孙子说：“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的这一思想，对和平时期部队建设也很有指导意义。“七计”之首，“主孰有道”？原意是讲，哪一方的国君比较贤明。其他六“计”昭示我们要具体从六个方面抓好部队建设：选好干部，培养良将；知天识地，天地于我；法令如山，依法治牢；兵种齐全，装备精良；士兵强壮，训练有素；上下同严，赏罚分明。

孙子的战略思想

安国为民乃用兵之首。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危也。”“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的意思是讲，军事上要赢得胜利，一是要修明政治，取得民心。国君不可因恼怒就发动战争，统帅也不可因气愤就挑起战争。合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就动员，不合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就停止。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彼知己，力求百战百胜或百战多胜，各级各类部队有着不同的要求，要因敌、因地、因时而异。如总部一级知彼知己的对象、范围、内容及内涵就不同于总队，各总队之间又不尽相同，各师又不同于总队，等等。

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在《谋攻篇》中指出：“百战而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讲百战百胜，不算是好中最好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是最好的。

先胜而后求战。孙子在《形篇》中指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这一军事思想的核心，是先创造取胜的条件，有了取胜的把握，而后才同敌人作战。

选贤任能育良将。孙子认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主张选拔将领，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才德，不可专尚勇力。

士兵训练有素，方能克敌制胜。孙武在比较战争胜负的“七计”中提出“士卒孰练”，经常有计划有步骤地训练士兵的身、心、胆、识和如何使用武器，务使士兵既娴于战斗，又习于武器，方能收到指挥如意，克敌制胜之功。这与吴起所说“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是一致的。

孙子指导战争的智慧和谋略

依据任务，以计制敌。孙子在《计篇》讲：“多算胜、少算不胜。”《形篇》讲：“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军争篇》讲：“先知迂直之计者胜。”都是教人要计定而后战。俗话说“一个不好的计划，胜于没有计划”就是这个道理。《管子》说：“估计必先定，而兵出于境；未定，而兵出于境，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统御有方，如网在纲。孙子在《势篇》说：“凡治众如治寡者，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者，形名是也。”这就是说，统帅大部队和统帅小部队一样，指挥大部队作战和指挥小部队作战一样，要分级编制，递相统领，联络畅通，如网在纲，有条不紊。

先知敌情，力争主动。孙子在《用间篇》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作战计划、执勤方案和用间（知敌情）是贯彻始终的，且互为关联。没有真实的情报，就无法制定取胜之对策。

集中兵力，以镒称铢。集中优势兵力，以多击少，造成“镒”与“铢”相差五百七十六倍之势，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指导战争，务求取胜的重要战法。孙子在《形篇》讲：“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讲：“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按孙子所讲，取胜之法，不可先传，但取胜之后，兵法战法，人们可以四处传播，多方研究。以计为首，以算为本，以谋为攻，以变为魂。

夺气夺心，怯斗乱谋。孙子在《军争篇》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队在接受任务，控制事态后，应尽快准确掌握敌对分子的核心人物，找准“头目”，对其实施宣传、瓦解、震慑，消其势，乱其心。使敌对分子士气不振，上下不一，怯于战斗；使其“头目”心乱不宁，难以运筹。我可乘其怯乱，一举破敌。

战胜不复，应形无穷。孙子在《虚实篇》说：“战胜不复， 而应形于无穷。”每次战斗都不能重复同一战法，而要适应情况，变化无穷。今天，部队担负执勤、处突、反恐、抢险救灾和防卫作战任务，遍布全国各地，各部队任务不同，所处地区不同，自身素质不同，各种情况都在发生变化，没有一定的成规可循。要活用原则，临事适变，从宜行权，以变迎变。

文化长廊

品读荀子 矢志于学

□张振飞

战国后期各思想流派争相发声为自家学说积极奔走相传，思想领域一片繁荣景象。儒家学派自孔孟之后呈现出的又一颗璀璨明珠荀子便生活于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荀子曾三次任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的祭酒，可见其思想影响之广大。我们现在想要窥究荀子思想，主要通过他所撰写的《荀子》一书。《荀子》一书最初有三百多篇，后经西汉刘向整理，编定为三十二篇，取名为《孙卿新书》。唐代时杨倞又将刘向的《孙卿新书》重新编排成二十卷三十二篇，取名为《荀子》，并为其做注，所以我们现在指谓的《荀子》，就是杨倞所编定的《荀子》。

《劝学》篇位列《荀子》开篇之首，荀子在此篇中将孔子的教育思想发扬光大，并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以“劝学”为题，荀子意在勉励人们要不停止地坚持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增长知识，发展才能，培养高尚的品德。在《劝学》中荀子开篇名义，首先论述了学习的重要性，并通过“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形象比喻，说明只要努力学习，后来者也能居上的深刻道理。荀子认为“君子”“圣人”所以能超越常人，并非先天的素质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而是后天勤学的结果，因此他在本篇中用“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善成德”而后达到“圣心备焉”的结果，说明学习过程是由浅入深和逐渐积累的过程，只有勤奋努力，不断积累，才能得到渊博的知识。

在《劝学》中荀子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其主旨在于强调学习对人的重要意义。荀子认为学习不仅可以使人“知明而行无过”，更重要的是学与不学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在。因此可知《劝学》篇列为《荀子》之首，意在说明学习的重要性和学习方法，这也是一个人的思想之逻辑开展的正确方法。

荀子以劝学为其思想展开之始点，其中自然有许多观点是映射着其思想之整体，在此试举两例加以分析。其一，“礼”是荀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由此可见礼的重要性。正因为这样，《荀子》全书始终贯穿着“隆礼”的主张，这也与他的性恶之基调是分不开的，即以礼的途径来规恶以向善。其二，“性恶”是荀子人性论的基础。荀子认为人性是自然具有的东西：“凡性者，天之忧也，不可学，不可事。”人性的具体内容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显然，荀子主张人性即诸种生理要求和心理欲望的总和。并且“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要改变人的性恶，就要“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并且经过“积善而不息”从而达到圣人的道德境界，即所谓的“涂之人可以为禹”，也就是通过学习来改变人性之恶。

中国的古圣先贤们大多都曾“劝学”。孔子主张学思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思有“五之法”，提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劝学》诗，强调勤奋刻苦、孜孜不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元末明初文学家，曾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在其诗作《送东阳马生序》中更是以“余则縕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来表达自己以学为乐的情趣。从这些先贤遗训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向来对学都抱有一份虔敬和信守。

观古训以醒当下，从荀子和古圣先贤们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不仅要懂得学习之重要意义，还要在学习中之方法和学习后之反思应用上有更多的努力。